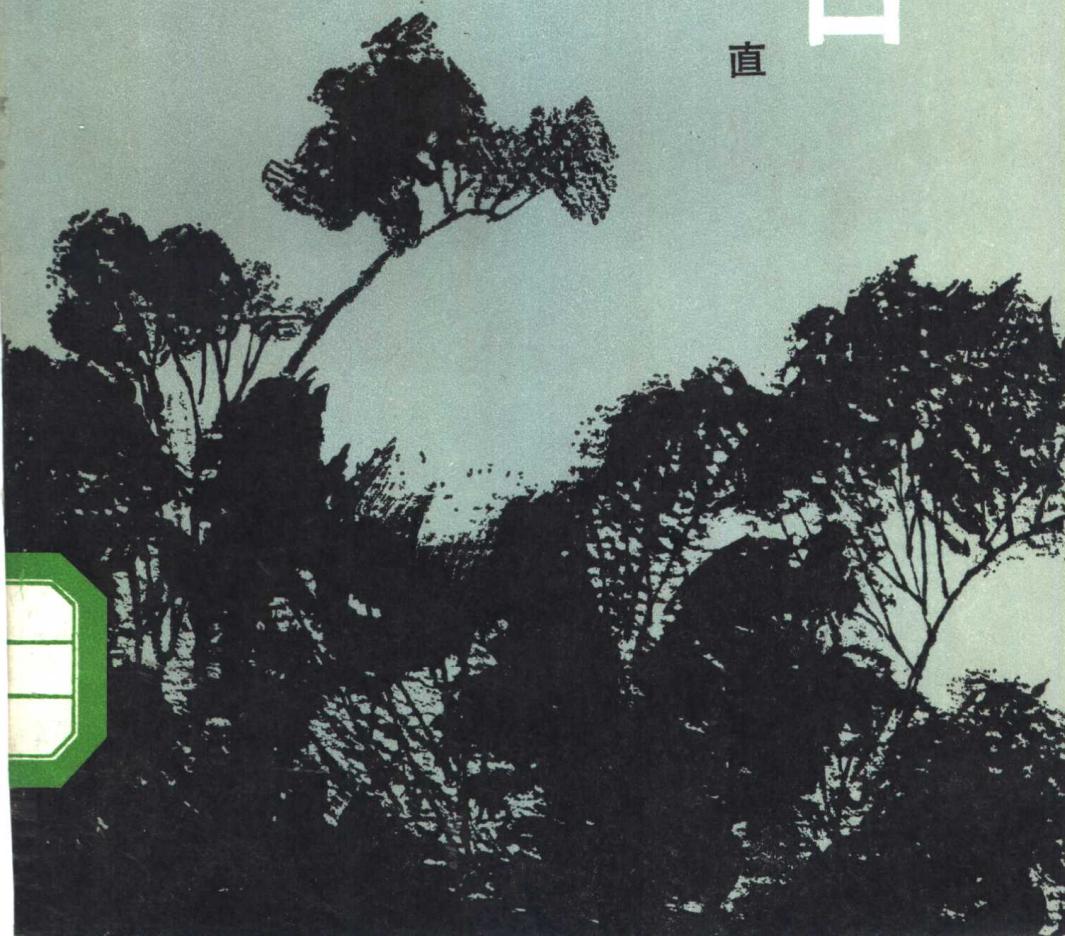


弯弓射日

王直



弯弓射日

王直著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弯弓射日

王直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9.375印张·200千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9,000 册

统一书号: 10185·81 定价: 1.70元

目 录

第一章 插入敌人心脏	(1)
一、百姓在祈求	(1)
二、“十二角星”	(7)
三、“一刀”	(17)
四、“两断”	(27)
五、“租地”抗日	(34)
六、经营“杂草丛生”之地	(38)
七、立牢脚跟	(44)
八、国民党来“收复失地”了	(50)
第二章 尖锐复杂的三角斗争	(56)
九、叶家棚子被围	(56)
十、放人还枪	(62)
十一、“火”中鸳鸯	(72)
十二、血布包着的心	(79)
十三、复杂的人物	(84)
十四、复杂的事件	(91)
十五、程维新的结局	(100)
十六、坚守戴家桥	(105)
十七、血染塘马	(116)
十八、“新四军根本没有走”	(121)
第三章 茅山子弟团	(125)

十九、两天三捷	(125)
二十、和谭师长磨嘴皮	(130)
二十一、巫恒通	(135)
二十二、民族魂	(140)
二十三、聚散起落	(145)
二十四、向敌机场要兵	(150)
二十五、改造起义部队	(153)
二十六、消灭刘洪奎	(161)
第四章 奋战在梅花桩间	(165)
二十七、又一个艰难岁月	(165)
二十八、第二次“皖南事变”	(170)
二十九、乾元观下	(181)
三十、钻牛角	(184)
三十一、恢复句北	(188)
三十二、夜袭包巷	(196)
三十三、百里火龙	(202)
三十四、茅山道士	(207)
三十五、“红白喜事”	(212)
三十六、考主力	(217)
第五章 进军天目山	(225)
三十七、雨夜混战	(225)
三十八、守备孝丰	(231)
三十九、六十两金子	(235)
四十、攻取天目	(241)
四十一、游禅林寺	(246)
四十二、激战七昼夜	(250)
四十三、虎将	(255)

第六章 告別茅山	(263)
四十四、一个难以交待的子弟兵	(263)
四十五、“枪炮一响脑壳凉”	(270)
四十六、拒绝投降，坚决消灭	(275)
四十七、撮合	(278)
四十八、再见吧，茅山	(286)
后记	(291)

第一章 插入敌人心脏

一、百姓在祈求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大日本帝国”的“大东亚共荣圈”“圈”到南京，南京顿时变成血与火的世界：烈焰冲天，三分之一的房屋化为灰烬；血流成河，四十万中国人惨遭杀害。

暴行！法西斯暴行！

被杀的是中国军人吗？绝大部分不是！日本侵略者手中的“三八式”固然是枪长刺刀长，可国民党军队的腿更长，没听到枪声就溜之大吉了。

时过境迁，今人或许有不太相信的：日本侵略者再凶残，也总不至于无辜格杀四十万中国平民百姓吧？且看当年日本《东京日日新闻》一篇题为《紫金山下》的报道：一名向雄、一名野田的两个日本兵，在攻打南京时展开杀人竞赛。他们在相约以谁先杀满一百人为优胜后，即从汤山开始，一路杀向南京。最后，各执血迹殷然、刀口已缺之刃，同进于紫金山下的中山陵前。向雄说：“我已杀了一百零五人，足下成绩怎样呢？”野田答：“我杀了一百零六个。”两人相顾大笑。不过，野田虽因多杀一人而获胜，然究竟谁先杀满一百人呢？无从判定。乃再约以杀满一百五十人开展竞赛……

此文，配有向雄、野田这两个杀人魔王的照片。这照片，映现出他们在杀人之后所获得的兽性的满足。日本法西斯的这种兽性，怕是四十万具血尸也不会满足的，他们不是“再约以杀满一百五十人为竞赛”吗？

不仅是南京城遭到浩劫。铁道两旁二十里以内的村庄全被烧光。二十里以外的，也是兽蹄过处，一片火海。水阳、乌溪、黄地、亭实、青山、护家墩、薛镇、小丹阳、溧水、句容、天王寺、白兔镇等等数不清的地方，有全被烧光的，有烧掉大半的。至于这些地方被杀的人，就无法统计了。

旧中国的人民千灾万难，这亡国之灾最惨，这亡国之难最痛！

人们在沦为任人宰割的亡国奴之后，才倍觉祖国的神圣。日夜盼望“驱逐日寇，还我河山！”

靠谁来驱逐日寇呢？靠谁来还我河山呢？

迷信的人们翘首望茅山，把希望寄托在茅山的神仙身上。

茅山，是座“仙山”。它位于南京以东百里许，方圆一百五十余里。本来，此山“山形曲折似句字”，叫句曲山。自从西汉元帝时，陕西咸阳的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到此山的三座山峰上结屋修炼，“得道成仙”之后，便改称茅山。三座山峰，也被象征“三茅君”，号为大茅峰、二茅峰、三茅峰。到东汉明帝时开始大兴土木，在大茅峰顶筑起一座规模不小的道观。宋延祐年间又加修建，赐额“圣祐观”。明万历二十六年，再赐额“九宵万福宫”。现在，这座道宫的高大门面上，就写着“敕赐九宵万福宫”这七个大字。其大殿之后有石台和石坊，坊的一面书刻“三

天门”，一面是“飞升台”，这就是当年茅盈“升天”的地方了。在大茅峰和二茅峰之间，还有一座“元符万寿宫”，是宋哲宗下诏修建的，“元符”就是这个皇帝以年号赐的名，并赐有玉质“九天仙都君印”一颗。此印，后来成为茅山道士的镇山之印，因而此宫又叫“印宫”。“印宫”内收藏的，除这颗玉印外，还有宋徽宗赐予的玉圭、哈砚、镇心符这三件珍宝。玉圭，墨色茬纹，形如蝙蝠；哈砚，形如金鱼，质地既象玛瑙又似水晶，放在手中哈一口气，即可润笔写字；镇心符，上刻“合明天帝日敕”字样。皇帝们这样又修宫又赐额又赐宝，茅山便名扬天下，因而四方资助，八方捐款，道观剧增，成为我国东南道教的中心。鼎盛时，仅“九宵万福宫”的周围就有大小道院二百五十七处。每年从农历正月十五日起，到三月十八日止，是香汛时节，方圆几百里内的善男信女，都赶来朝圣进香。有些香客，虔诚得一步一磕头，从山脚一直磕到山顶。

“一峰高出众峰颠，疑隔尘沙路几千。俯视烟云来不及，仰攀萝茑去无前。”这是宋代政治家王安石游茅山时留下的诗句。茅山尽管不算高，海拔不过三百七十二米，但东、南、北三面的山势，却正如诗中所描绘的那样险峻。险峻而又林木幽深，景致清雅，便使那些常年挣扎在红尘中的善男信女，一进入茅山就顿生“隔尘”之感。再“步步入山门，仙家鸟径兮。渔樵不到处，麋鹿自成群。石面迸出水，松头穿破云”，就真是恍入仙境，“万念”都要“俱寂”了。

“天下洞天三十六，华阳第八称句曲。”这是对位于大茅峰以北一公里处、清朝康熙皇帝南巡时御笔题为“华阳洞天”的华阳洞的赞诗。茅山的地质结构很有特点，一是

岩石的年龄和性质庞杂。二是地壳断层十分发育。因此，我国举世闻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三十年代就曾经到过这里作过考察，并把它作为一处标准地质载入地质史册。这其中的专门学问，平常人固然不懂，可山中那许多天然形成的山洞，却是有眼就能看到的。这许多山洞，不少是有着象茅山得名那样的仙家传说。华阳洞，就因自称华阳居士的南朝齐梁时著名道教思想家陶弘景“修炼”于此而得名。那些常年挣扎在红尘中的善男信女，踏进这“虚四郭上下皆石，内有阴晖夜光日精之根，阴晖主夜，日精主昼，形如日月”之光的华阳洞进香，踏进神秘色彩的仙人洞、玉柱洞、篷壶洞等洞进香，便恍入神仙洞府，那颗虔诚的心越发虔诚啦！

其实，当年的茅家三兄弟，是因为采药行医，为百姓解除病痛，才被人们当作活神仙来崇敬的。而这三个兄弟，千里迢迢地相继来到茅山，大概也只是因为看中茅山这个野生中药材的宝库。后来的大药物家李时珍，就专到这个宝库考察过，写在《本草纲目》上与茅山有关的中药材就有三百八十多种。过去的道家，不少人是采药炼丹的医家。茅家三兄弟是如此，华阳洞“洞主”陶弘景也是如此。茅山上有座抱朴峰，山麓有口葛仙井，是自号为抱朴子的东晋道教理论家葛洪所留下的“仙迹”。葛洪，不仅是位著有《肘后备急方》等书的医家，而且是位擅长炼丹的化学家。世界上第一个炼出水银的人，据说就是他。而宋哲宗下诏修建“元符万寿宫”的直接原因，也是因为居此修道的刘混康医术高明，治好了太后的头痛病。茅山上的这些仙人，原是些精于医道，为人们所神化了的医家啊！

既被神化，便受敬奉。茅山下的芸芸众生，在尘世间

百般受苦，登上茅山这“隔尘”之地，向众仙焚香膜拜一番，多少也能得到一点精神上的解脱。神灵神灵，信之则灵。人们祈求降福不可得，得到一点精神上的解脱，也就算是灵验啦！可如今沦为任人宰割的亡国奴，大灾大难降临，还是只知翘首望茅山，还是只知虔诚地膜拜，连那点精神上的解脱也不可能得到啰！日本侵略者的烧杀与日俱增，人们心头的悲痛也只能是有增无减，哪会因膜拜虔诚而“解脱”一分？

看，茅山上那些仙人们的徒子徒孙，一批一批地下山来了。他们是接受膜拜，下来“撒豆成兵”，驱逐日军，拯救百姓的吗？不是。他们是下来做道场的。他们的本事，只能为死难的同胞做做道场，招魂超度，无能为活着的苦难同胞免去这场血光之灾。

“我们自己的中国军队都到哪里去了？”人们翘首望茅山，祈求神仙保祐无望，便回到现实中来，祈求军队的保护。

这时的茅山，应该说“中国军队”还是有的。不仅有，而且几乎遍地皆是。国民党的军队固然是一溃千里，一时无影无踪了，但他们逃跑时丢盔卸甲，扔下了十几万支枪。这十几万支枪，大都成了日军的战利品，用来武装伪军。少部分，则散落在民间。这少部分，是“十几万”这个总数中的少部分，数量并不少。由于不少，所以价贱：一毛钱可买到一斤子弹，两毛钱可买到一颗手榴弹，一块钱可以买到一支枪，六块钱可以买到一挺机枪。于是，青帮、红帮，地痞流氓，便收敛起这些枪支弹药，招兵买马，立地为王。一时间，三里一个团长，五里一个司令，“团长多如毛，司令遍地跑。”这些团长、司令，各自领着一伙人，专

干敲诈、抢劫、奸淫、烧杀的勾当。江宁第四区赵家村一带，二十余里的房子就是他们烧的，当地老百姓也被他们杀了一百多。虽然，他们也打着抗日的招牌，自称是中国的什么军、什么队，但人们只能把他们称为“小日本”。

当然，收敛枪支拉队伍的人中，也有民族正义感强烈的青年师生和爱国人士。溧阳的张之宜、朱行厚、陆平东等就属于这一类。他们分别拉起一百多人、五十多人的队伍，一心抗日救国。但在强大的日伪军和多如牛毛的土匪部队的夹缝中，很难立住脚。

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新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成立。新四军由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整编而成，全称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这消息传到苏南，传到茅山地区，了解底细的人高兴极了：“新四军就是当年的红军啊！”打土豪、分田地的红军，有些人是熟悉的。苏南是我们党最早建党的地区之一，不少地方在大革命时期曾经举行过多次农民武装暴动，人们对共产党，对红军，印象深刻。如今为抗日，红军整编成新四军，都感到这才是“我们自己的中国军队”，“驱逐日寇，还我河山”有指望了。张之宜、朱行厚、陆平东等人在遭到挫折之后，也就赶到南昌去了。但人可走，山不能搬，新四军能不能开到苏南来呢？能不能开到茅山来呢？

会开来的。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建立长白山、五台山、太行山、泰山、燕山、茅山等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同月四日，中共中央更直接写信指示新四军要开进苏南、茅山，创造抗日根据地。茅山，横卧在南京、镇江之郊，曲伸于

句容、金坛、溧水、溧阳四县之境，是南京的东面屏障。南京，是日伪的政治中心，又是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所驻的军事要地。而茅山所在的苏南，东起淞沪，西至宁芜，南襟太湖，北带长江，经济上十分富裕，已成为日军进行掠夺、“以战养战”的聚宝盆；军事上更是至关重要，已成为日军进犯华中、保障华北、实行南进、亡我中华的枢纽。对这样一个日本侵略者的心脏地区，我新四军怎会不给他插上一刀？

可是，正当我们各支红军游击队从各个山头下来整编，准备开赴敌后为民族的生存而决斗的时候，国民党竟冒天下之大不韪，趁机对我实行“燃箕煮豆”，真令人“怒发冲冠”！

二、“十二角星”

国土沦亡，人民呼救，我们这支在闽西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部队，和南方的其他红军部队一样，为救国救民下山了。那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初的一个傍晚，夕阳西照，半山红霞半山夜色。这景象，恰如当前的局势：一面是我们诚心实意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面是国民党想借此“燃箕煮豆”，一口吃掉我们。

越过山口了，深一脚浅一脚，我们得步步小心；穿过山坳了，高一脚低一脚，我们得步步警惕。国民党要“燃箕煮豆”，这并不是我们凭“四·一二”的历史惨剧推演出来的，而是挟一党之私的国民党，确实在置民族的生死于不顾，处心积虑地要搞掉我们。上个月——一九三七年七月发生的“漳浦事件”，就是证明。七月十四日，我闽南

红三团根据与国民党闽南驻军一五七师所达成的“一致抗日”的协议，下山驻于漳浦孔庙。两天后的十六日，也就是日军发动“七·七”芦沟桥事变的第九天，那个一五七师便设下集中点名发饷的圈套，将我红三团诱至体育场缴械。近千人的队伍，只由副团长卢胜和参谋长王胜率领少部分同志突围出来。

我们下山，又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暗算呢？

部队驻于永定县金丰的大溪坪一带，我们枪不离身，枕戈待旦。国民党见无法下手，便要将我们改编为保安团。不去抗日前线，在这里保谁的安？分明是借此把我们吞并掉！我们当然不能答应。于是，他们就要调我们去漳（州）厦（门），说：这总是上抗日前线啰！果真是放我们去杀敌御侮吗？不！他们是投我之所好，调我长途跋涉，以图中途设伏，一举将我消灭！我们当即揭露了这个阴谋，坚决加以拒绝。

这时，发来了新军服。开始，大家都很高兴。钻山窝，打游击，军服都破得不象样啦！可翻开这新军服一看，一颗“十二角星”露了出来。“青天白日”十二根刺，是国民党那“青面獠牙”的帽徽啊！顿时，不少同志抓起它，“呸”地一声摔到地上，大声嚷道：

“这‘青面獠牙’打了我们十年，现在又不顾国难当头，搞阴谋，要诡计，吃掉红三团，还想吃我们。我们不上口，就又变出这个花招，摘掉我们的红五角星，换上他们的十二角星，让我们也变成‘青面獠牙’。哼，这是在‘青天白日’做大梦！”

这就有点误会了。国民党固然有用这“十二角星”来“统一军队”、“统一军令”的用心，但我们的党中央从团

结抗日的大局出发，不予计较，坦然接受了。因此，将它看成是国民党要弄的新花招，是不够恰当的。不过，在这旧恨添新仇的时候，战士们不接受这个“十二角星”，也是可以理解的。阮文松同志和我自己，心里就有疙瘩嘛：合作抗日，非戴这种缀着“十二角星”的国民党的军帽不可吗？

阮文松同志，原是由红九团二营和岩、连、宁游击队合并组成的一支队的支队长。我嘛，是支队党总支书记。抗日整编，他下连当连长，我下连当指导员。支队长一下子变成连长，支队党总支书记一下子变成连指导员，这个弯好转；要将红五角星一下子变成白十二角星，这个弯就难转啦！当然，我是指导员，难转也得转。为此，我召开了党的支部会议，又召开了军人大会，动员戴这种“十二角星”的军帽。

“同志们，这种没有角的圆帽子，这种十二个角的帽徽，是姓‘白’，我们戴上了，是会觉得头发胀。不过，为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我们还是得戴上。只要我们的心是红的，就是戴上了也没有什么关系……”

我边动员边看战士们的脸，唉，一张张都绷得紧紧的，一点笑容都没有。有的人，还眼睛瞪得大大的，牙齿紧紧地咬住嘴唇。我们的战士啊，生活再艰苦，处境再危险，也是一动员就嗷嗷叫的。这样一种气氛的动员会，哪有过？我，头上淌汗，背上湿衣了。

会后，我到各班去了解反映。先到四班，没进门就听到班长黄步皇同志在吼着骂人：

“我身上的枪伤是哪个打的？不是别个，是你！”

哦，他不是和同志们吵骂，是在自个儿骂白军！

“我家的房子是哪个烧的？不是别个，是你！”

他自个儿这样骂白军，怎么骂得起来？恐怕是在指着“青面獠牙”骂的吧！

“我的爹爹是哪个杀的？不是别个，还是你！”

果然，他是抓住“白帽”，指着“青面獠牙”骂的！

黃步皇，是个虎里虎气的井岡山翻身农民。家庭的仇，阶级的恨，使他敌我界线分得非常清楚，打起仗来也特别勇敢，四次负伤，次次都是坚持到战斗胜利才下火线。这样的同志，要劝他戴上那缀着“十二角星”的帽子，难哪！而他要是不戴，四班的同志就谁也不会戴。

“去你娘的！”黃步皇口里骂着，手里把“十二角星”连同那沒有角的圆帽子一齐摔到地上。然后，走到墙边，摘下挂着的红五星八角“列宁帽”，双手捧在胸前，眼睛深情地望着，手指轻轻地摸着，眼泪一颗颗地滚下来。

我不敢走进屋里去。走进去怎么说啊？只有转身离开。

一个月过去，谁也没戴那种国民党的帽子。我真有点着急啦！这帽子是上级叫戴的，硬是这样拖着不戴，怎么能成？不管怎样，总得说服同志们扭过劲来。可怎么说服，怎么扭呢？还是“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得戴上，只要我们的心是红的，戴上也沒关系”这样几句话，是说破嘴也服不了、扭不动的。唔，得说点别的道理才成。可别的还有什么道理？我脑子空空的，实在想不出。

“报告，门口来了两个华侨，要见连首长，让不让他们进来？”

“叫他们进来吧！”我看了喊报告的六班长黃杵宝一眼，觉得见见华侨也好，我得休息一下啦！在这之前，我

还不晓得“伤透脑筋”是个什么滋味。这一回，我算是尝到了：头痛筋跳，口舌发干，吞口水都困难。

两个华侨进来了，是由交通总站的交通员许仁山同志带进来的。我警惕地看着他们：嘿，头发油光光，衣裳抖索索，不是地主就是资本家！可是奇怪：这样一种人，怎会由仁山同志带着？我不免又对他们上下打量了一番，觉得其中有一个挺面熟的。

“先生，你们从哪里来？”我一面请坐、倒水，一面看着那个面熟的问。

“从下洋来。”这面熟的，眼睛也不停地扫视着我。

下洋离我们这里不过十五里路，没听说过有这么两个华侨。

“先生是从南洋回来探亲的吧？”我再探问了一句。大概是我说话的乡土音太重——我参加红军虽然已经六年，但基本上都在闽西一带打转转，所以脱不了这口闽西腔。那面熟的华侨听了，微微地点着头，也不回答我的问话，盯着我说：

“我好象在哪里见过你。”

嗬，他对我也面熟！我不禁耳辨他的口音，眼看他的面孔，记忆里一下浮现出一个身穿破旧土布衣裳的憨厚农家后生来，便试着说：

“你是上杭人？”

“对啊，我看你也是！”

“你是是钦迟三哥的儿子书堂呀？”

“是哩！你哥哥是四羊子，你是五羊子，对吧？”

他叫出哥哥和我的小名来，说明他确实是那个一九二七年参加农民暴动、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军的王书堂。要是